

# 河北正定巨碑考证

□ 樊志勇

2000年6月22日,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河北正定旧真定府衙南百米处路西一建筑工地,一尊重约107吨的巨型青石螭趺碑座并18块大小不均的巨碑残块重见天日。有关巨碑名称、碑之主人、刻碑年代、碑文内容、毁埋原因等问题,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与猜测。

## 一、有关巨碑身世的研究

对正定巨碑的考证最具权威的研究是《正定巨碑主人及被毁原因初探》<sup>①</sup>(以下简称《初探》)。整篇《初探》从五个方面并以如下五个标题进行研究考证:

“一、巨碑刻立年代,应在后唐明宗(926—933在位)以后,而在北宋欧阳修庆历四年(1044)出任河北都转运按察使之前”。“二、该碑应是企图僭伪称帝的当地节度使为自己刻立的所谓‘纪功碑’”。“三、‘胜州刺史’的官职,为确定该碑与安重荣的渊源关系提供重要线索”。“《通鉴》记载:安重荣在投靠石敬瑭以后,于天福元年(936)也曾经被委任为胜州刺史、北面招收指挥使。”“四、巨碑所记的人物事迹,与史籍记载的安重荣身世相符”。文中考述:“天福六年(941)……在发生挟持契丹使者事件后……他效仿李宝臣为自己建造的当时最高大的功德碑”。“五、巨碑刻立不久被毁的原因,与安重荣谋反被诛有

关”。

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在《新出石刻唐代文学研究》一文中认为:“此碑应即《册府元龟》所载后晋天福二年太子宾客任赞撰文的《安重荣德政碑》。几年后,安重荣谋反被杀,碑也遭砸碎<sup>②</sup>。”

作为正定本土子民,笔者深感明晰家乡宝物之真实面目系责任所在,拟在《初探》基础上,对残碑研究并从史书中寻到一些有关安重荣与巨碑的新资料。以为更进一步分析研究巨碑名称、撰文与刻立时间、碑之反映的五代时期成德军的政治、军事、历史文化等提供证据。

## 二、关于巨碑名称等相关问题的几点考证

1. 巨碑的名称、撰文与刻立时间。《册府元龟》卷820记:“晋安重荣为成德军节度使。天福二年,副使朱崇节,奏镇州军府将吏、僧道、父老诣阙,请立重荣



正定巨碑 沉睡于地下约1058年的巨型青石螭趺碑座



正定巨碑 三块相连的残存碑文拓本

德政碑。高祖敕安重荣功宣缔构，寄重藩维，善布诏条，克除民瘼。遂致僚吏、僧道诣阙上章，求勒碑铭，以扬异政。既观勤政，宜示允愈。其碑文仍令太子宾客任赞撰进。”《全唐文》第116卷载晋高祖《允成德军请立节度使安重荣德政碑敕》：“安重荣功宣缔构，寄重藩维，善布诏条，克除民瘼。遂致僚吏、僧道诣阙上章，求勒碑铭，以扬异政。既观勤政，宜示允愈。其碑文仍令太子宾客任赞撰进。”两书中对巨碑的名称、撰文的时间有了准确的说法：即碑名为《安重荣德政碑》，撰文的时间应为后晋天福二年，即937年。而碑毁时间是在天福七年（942年）正月初二安重荣被害不久，该碑实则立起不足四年或四年余。

做此推论的原因是：其一，该碑确已立起。《宋高僧传》卷22《狂僧曹和尚》载：“镇州释曹和尚者，恒阳人也。不常居处，言语纠纷，败儒穿履，垢面暗肤，号疯狂散逸之伦也。……府帅安重荣，坐镇数年，讽军吏州民，例请朝廷立德政碑。碑之将树之日，其状屹然。曹和尚指之大笑曰：‘立不得！立不得！’人皆相目失色，主者驱逐，曹犹口不绝声焉。”屹，高耸直立貌；其状屹然，说的是曹和尚目睹到巨碑的高耸貌。天福六年（941年）腊月至天福七年

（942）正月初二，“重荣潜萌不轨，秣马厉兵，垂将作逆，朝廷讨灭，碑寻毁之”。寻就是旋即，不久。说的是安重荣碑在其遇害之后旋即或在不久后被毁。由此判断，碑毁时间应该是在942年的某月。

其二，该碑立碑的时间当不等于该碑的撰文时间，也即该碑不可能是在天福二年即937年所立。《册府元龟》、《全唐文》中，记述了天福二年晋高祖石敬瑭敕“其碑文仍令太子宾客任赞撰进”。说的是石令任赞撰写碑文，但两书中均未曾记有刻文立碑之事；另析当时实况，真定城中本无巨石，如此之巨大的石料从真定西部山区运至城内，必须在严冬以水成冰后，巨石才能在冰上行运城中。即便天福二年的腊月已将巨石运来，但考虑其打制成型、刻字刻画等花费的时间，该碑在其当年也不足于立。除非此巨石是在此以前的冬季由其前任节度使已运至城中，此可能性虽有，但极小。由此判定：该碑非天福二年即937年所立，而其立碑之上限最早应在天福三年即938年的某月。

2. 刻立《安重荣德政碑》之前既有“请示”，又有“批示”。《册府元龟》明确地记载了成德军副使朱崇节奏晋高祖石敬瑭：“镇州军府将吏、僧道、父老诣阙，请立重荣德政碑。《宋高僧传》也记述府帅安重荣，“讽军吏州民，例请朝廷立德政碑”。讽就是说法含蓄、不明说。此说是安重荣暗示镇州军吏州民上书朝廷为己立碑。残碑中刻有“镇州军□官吏耆……”的文字，其中“镇州军”后面的空字，应为府字；耆指60岁以上的老者。此正好与《册府元龟》书中“镇州军府将吏、僧道、父老诣阙，请立重荣德政碑”的记述相吻合。而《全唐文》记有晋高祖《允成德军请立节度使安重荣德政碑敕》，这是石敬瑭的批示。在残碑中有“敕撰”二字，亦正好与史书记载相符，说此碑是奉晋高祖石敬瑭的敕而撰写的。以上说明，此碑立之前，既有请示，又有批示，并且石敬瑭还诏令太子宾客任赞为其撰写了碑文。

3. 安重荣的碑，立碑时不是“企图僭伪称帝”。此碑是当时的皇帝为表彰其德政、功绩而敕建的。查《资治通鉴》卷281所记，安重荣是在天福二年（937年）正月初二，被石敬瑭任命为成德军节度使，并且“丙辰，重荣奏已视事”。五代时期的安重荣大年初二受命，大年初三就职治事，足以说明安的勤政。《新五代史·安重荣传》载其“虽武夫而晓吏事，其下不能欺”，在出土残碑文中同样有“上既闻异政，洞察群心，思九域之……”的记述，说明安重荣懂得吏治，办



事认真,在镇州政绩突出。出土残碑中亦有“……德惟其贤,贤之与能,公皆有矣”。说的是安重荣贤之与能德才兼备。石敬瑭得天下,安有显赫战功,而937年,又是安重荣关键的一年,即正月初二受命,初三赴镇州上任治事。但不知在哪个月份撰写的碑文,虽然任职时间上还不到一整年,但是在客观上,应该说这一年的安重荣,一是感激石敬瑭的提拔重用;二是安精明能干,处事决断,勤政治事,作了一些令军府



正定巨碑 碑座右侧面线刻画摹本

将吏、僧道、父老所拥戴的德政事。且晋高祖敕立其碑,更足以说明安在镇州政绩突出,既然立此巨碑之前,有请示,有批示,安还有许多德政,那么,说安此时立此碑是“欲谋自立为帝”是不成立的。至于天福四年安“有飞扬之志”,至天福六年腊月安举兵反晋,那是后事。

4. 安重荣没有“于天福元年(936)也曾经被委任为胜州刺史、北面招收指挥使”。为考证残碑中“胜州刺史、以前充西北面……”的碑文“与史籍记载相近”,《初探》文称:“《通鉴》记载:安重荣在投靠石敬瑭以后,于天福元年(936)也曾经被委任为胜州刺史、北面招收指挥使。”笔者查阅相关资料,《资治通鉴》成书于宋元丰七年(1084年),现存最早的刻本除北京图书馆藏有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根据北宋本重刻的一本之外,其流传下来的则是由七个宋刻残本拼凑的“宋百衲本”,此外,后人针对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研究也很多。这些研究著作,大致包括注解、考证和补遗三类。如:宋人王应麟的《通鉴地理通释》,元朝人胡三省的《通鉴音注》等。后中华书局以《资治通鉴》为书名,重刊了元人胡三省的《通鉴音注》。《初探》所说的《通鉴》,应是《资治通鉴》的简称。查《百衲本资治通鉴》中有关安重荣在936年、937年初的记载文字中均没有安重荣“于天福元年(936)也曾被委任为胜州刺史”的记事。查中华书局出版的《资治通鉴》,即元人胡三省《通鉴音注》,有关安重荣在936年、937年初的记载文字同于《百衲本

资治通鉴》,只是在“诏以前北面招收指挥使安重荣”之后以小号字加注了“此以在晋阳围城中所授安重荣军职言也,故曰前”的文字。此为元人胡三省对《百衲本资治通鉴》研究的一人之见,笔者认为其注有误。同时,胡本《通鉴》中亦没有安重荣“于天福元年也曾被妄任为胜州刺史”的记载。从时间分析,石敬瑭于936年11月做了后晋皇帝,之前被后唐重兵围于晋阳,之后在契丹军的帮助下,石敬瑭集兵力、入洛阳、灭后唐。用兵一时的石不可能委任安去胜州,而在937年的正月初二石任命安为成德军节度使。客观上说,这之前也不可能派安去胜州任职。《旧五代史·安重荣传》记载:其父安全,后唐明宗时“胜州刺史、振武蕃汉马步军都指挥使”。残碑中的“胜州刺史、依前充西北面……”是指安重荣的父亲安全曾任过胜州刺史。另关于“北面招收指挥使”的官职,查《辽史太宗纪》中有“六月,北面招收指挥使安重荣以部曲数千人入城”的记述,说的是936年6月,安重荣率部曲千人入晋阳城投石敬瑭一事。此说明,936年6月,安重荣在投靠石之前,已经是“北面招收指挥使”了,而这一官职怎么能说是“安重荣在投靠石敬瑭之后,于天福元年(936年)也曾被委任为”此职呢?

#### 5. 对出土残碑两句碑文的解读:

(1) 残碑中刻有“……疲俗水为船而陆为驢岂让夷吾金如粟而马如羊未慚张奐……”的碑文,《初探》将此断句并解释为“‘岂让夷吾金如粟,而马……’,

显然是夸耀镇州金银如粟一样多,马匹强壮,其能畏惧契丹蛮强。”笔者认为此碑文中的“水为船而陆为驥”对应着“金如粟而马如羊”,而上句中的“岂让夷吾”,则对仗着的下句的“未惭张奐”。夷吾:春秋初的政治家,姓管,字仲,名夷吾。助齐桓公改进宗制,富国强兵,成为春秋时期第一霸主。张奐:东汉大将,公元前167年,任武威太守时,实行平徭均赋;革除了凡是二月、五月出生的孩子及与父母同日生者全部处死的当地陋习,百姓便与他生为立祠,以示爱戴。残碑中的此对称句是碑文作者太子宾客任赞在盛赞安重荣的德政,不仅可与当年的管仲相比,亦不逊色于东汉的张奐。如将夷吾的名字拆开说成“岂让夷!吾金如粟而马……”,并把“岂让夷”解释为“岂能畏惧契丹蛮强”,就是借给任赞十个胆,这位奉石敬瑭敕的太子宾客,也是决不会撰写得罪石已“父事”了的契丹的。

(2)《初探》文中写道:“安重荣喜欢使用铁鞭为武器……号‘铁鞭郎君’。在残碑文字对碑主人的盛赞中有‘戟射小技,孰偕勇略,鞍横长槊’。槊,就是铁鞭。这都与安重荣身份相符。”其实,槊与鞭皆为古代兵器。槊是由矛与棒演变而来的。《正字通》一书中云:“矛长丈把谓之槊。”《现代汉语词典》中,槊,是杆儿比较长的矛。《三国演义》中曹孟德当年不是曾横槊赋诗么。而鞭则是用铁制成的有节而没有锋刃的短兵器。槊,又怎能就是铁鞭呢。再,《初探》文在引用上句残碑文字时,并将碑文中的“戟射小枝”误识为“戟射小技”。戟:古代一种在长柄一端装有青铜或铁制成的枪尖、旁边附有月牙形锋刃的兵器,这月牙形的锋刃又叫做戟小枝。《三国演义》第十六回有“吕布一箭正射中画戟小枝”之描写。碑文中的“戟射小枝”盛赞的是碑主人“善骑射”、并亦有百步之外一箭能射中戟小枝的精湛箭术。

### 三、观残碑记事, 窥五代时期的后唐、后晋与契丹

五代是处于唐、宋两大统一王朝之间一个短暂分裂的时代,也是唐末藩镇割据的继续。真定作为兵家必争之地,戈兵抗攘,几无虚日。出土残碑中的6块带字残碑,对研究此碑内容及五代时期真定的政治、军事、历史文化,特别是对研究成德军与后唐后晋、与契丹的关系有其重大参考价值。

在唐末政治陷入混战的时期,北方的少数民族契丹乘机发展起来。五代时期,契丹人不断南侵。后

唐庄宗李存勖、明宗皇帝李嗣源顺应广大军民意愿抗击契丹南侵。923年李存勖在李嗣源、李从珂、石敬瑭等大将支持下,灭后梁建后唐,即位于邺,改元同光。924年正月,契丹侵扰,庄宗命李嗣源为北面行营招讨使,将兵救幽州。925年,诏以李嗣源为成德军节度使,坐镇真定,声援幽州抗击契丹。李存勖当了四年的皇帝“遇内乱而崩”,后庙号庄宗。926年李嗣源当了皇帝,改元天成,后庙号明宗。残碑中有“……明宗皇帝任之……”,可惜因其前后均无文字相连,不知“任之”当为何意。其可能意应该有二:一指《资治通鉴》中记有明宗皇帝在925年任职过成德军节度使;二是残碑中有“上在北京日授光禄……”的记述。其“上”应是指皇帝石敬瑭,“北京”是指今太原,而不是指今正定。“授光禄……”等官职是“明宗皇帝任之”诏授给石敬瑭的。《旧五代史·高祖纪一》中,有“明宗即位,改元天成。五月,嘉帝光禄大夫、检校司徒”的记述,帝指的是石敬瑭。

继明宗后的闵帝李从厚十分软弱,很快被明宗的养子末帝李从珂杀掉。据《资治通鉴》卷279后唐纪八记载,李从珂即位后,石敬瑭久居太原,拥兵自重。为削其权,李从珂诏任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把石从晋阳(太原)欲调郢州。

936年五月初十,石敬瑭自晋阳起兵反叛。五月二十,李从珂发兵围石于晋阳。五月下旬,原本在代北地区戍守的振武西北巡检使安重荣,“帅步骑五百奔晋阳”,投靠石敬瑭。至八月初,后唐的军队“筑长围以攻晋阳”。石敬瑭以刘知远为马步都指挥使,安重荣、张万迪降兵皆隶焉。知远用法无私,抚之如一,由是人无贰心。石敬瑭亲乘城,坐卧矢石下,晋阳城池坚固,唐军急攻不下。《资治通鉴》中的上述记事,在残碑中有着相同记述:“赏劝时属伪庭失德,群盗挺(起)……”。赏劝:是指末帝李从珂下诏委任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把石从晋阳调郢州一事,伪庭:是指末帝李从珂的朝廷。《旧五代史》有“伪将张敬达引军逼城设栅”的记述,说的是末帝李从珂命大将张敬达率大军围石敬瑭于晋阳之事。残碑中的“外则亲当矢(石)”,“内则设固金汤”指的是在晋阳守城战中,石敬瑭为鼓舞士气,亲自登城坐卧在围军的矢石投射之下,视察部属兵卒,守城将士齐心协力,城池防御坚不可摧。残碑中的“(遵)带砺而誓山河,别擗良史,公竭诚佐”。因晋阳守城战是安重荣等众将辅佐,及在契丹的帮助下,石敬瑭推翻后唐建立大晋王朝的第一次重大战役,所以太子宾客任赞在碑文中



以重笔称赞晋阳之战对大晋的建立是意义重大的关键之战,不论时间多久远,都将永载千秋史册。而在这次大战中,“公竭诚佐”。“公”指的是安重荣。这是一句极高评价的赞誉之辞,用以褒奖、盛赞安重荣竭尽忠诚、全力辅佐石敬瑭灭后唐之事。这应该是安重荣德政碑中记述的安的主要功绩之一。

公元936年九月,契丹耶律德光率骑兵五万援救石敬瑭,并大败后唐军。残碑中的“远扈万乘,来定三川”与《资治通鉴》中“九月,契丹主将五万骑,号三十万,自扬谷而南,旌旗不绝五十余里”,“契丹主谓石敬瑭曰:‘吾三千里赴难,必有成功’”的记述写的都是契丹五万骑,自扬谷而南三千里赴晋阳助石敬瑭反后唐建后晋之事。同年十一月,“契丹主作册书,命石敬瑭为大晋皇帝”。石敬瑭割幽云十六州与契丹,仍许岁输帛三十万匹,并尊契丹主耶律德光为父皇帝。天福二年(937年)正月,石敬瑭拜安重荣为成德军节度使。石靠卖国登极,遭人唾骂,又兵火之余,国库弹竭,民间困穷,而契丹征求无厌。天福三年时,安重荣已对后晋高祖石敬瑭与契丹约为父子,割让幽州十六州,以为“此晋之万世耻也!”安并对契丹王朝深恶痛绝。《资治通鉴》在记天福六年(941年)事中写道“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耻臣契丹,见契丹使者,必箕踞谩骂,使过其境,或潜遣人杀之;契丹以让帝,帝为之逊谢。六月戊午,重荣执契丹使拽刺,遣骑掠幽州南境,军于博野,上表称‘……愿自备十万众,与晋共击契丹……’表数千言,大抵斥帝父事契丹,竭中国以媚无厌之虏。又以此意为书遗朝贵及移藩镇,云已勒兵,必与契丹决战。”腊月,安

闻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举兵反晋,便“大集境内饥民,众至数万,南向邺都,声言入朝”。石敬瑭急派天平军节度使杜重威率兵征讨。两军鏖战于宗城(今广宗)西南。安因部将反叛,被杜重威大败,仅率“十余骑走还镇州”。天福七年(942年)正月初二“镇州牙将自西郭水碾门导官兵入城,杀守陴民二万人,执安重荣,斩之。……石敬瑭命漆其头颅,函送契丹。并改镇州为恒州,改成德军为顺国军,以杜重威为节度使。”而后为消除安重荣的影响,杜将安“碑寻毁之”,并深埋于地下。

正定巨碑、赧质重见天日吊运开元寺已近10年,现整日遭受着风雨侵蚀,青石风化严重,特别是赧质碑座背部驼峰右侧那幅绘有端坐于麒麟之上的碑主人及14位栩栩如生随从人物,能够充分彰显五代时期正定匠人绘画水平和艺术风采的线刻画,现已模糊难辨。如不加重点保护,其后果更不堪设想。建议相关部门拨款保护。

(本文为2009年度石家庄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登记号09WH07)

[1] 梁勇《正定巨碑主人及被毁原因初探》,《文物春秋》2000年第5期。

[2] 陈尚君《新出石刻唐代文学研究》,载《中国文字研究》第28期,2002年。

(作者工作单位:中共河北省正定县委党校)

(上接9页)

离奇的故事为元代雕塑家刘奎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他在充分吸收民间营养的基础上,最终创作出了这一组独特而伟大的艺术作品。刘奎创造性地吸收了晋城地区爱用动物表示人的性格特征的地方特点,结合唐初的五行学家袁天罡把二十八宿与二十八种动物联系在一起的组合模式,在这些人物化的神像旁边加上了动物的形象,并在每个星宿名下分别缀以日、月、金、木、水、火、土,使星宿的名称由原来的一个字变成了三个字,不仅使这些神像内涵大为深化,而且性格特征也表现得更加突出,

被专家誉为同类型彩塑艺术的海内孤品。

晋城玉皇庙不仅有古代的“天文馆”美称,而且在彩塑艺术的创作上有许多创新和神来之笔,这些彪炳千秋的星象神祇塑像,不仅是我国彩塑艺术中的珍品,而且是研究我国古代天文学的重要实物见证,对研究古代道教的神祇崇拜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省晋城市玉皇庙文物管理处)